我国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机理与路径^{*1} ——基于义乌案例的分析和启示

刘文革 杨志文

【摘要】: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为世界的共赢共生发展提供了顶层方案。对于我国包括省级及以下行政区域的地方而言,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必要,而且应成为一种自觉,这是由空间交互机制、经济基础驱动、政治文化等元素决定的。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的浙江省义乌市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对于我国其他地方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地方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义乌案例 义乌商圈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的战略家思维、全球化视野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①国内学术界、理论界围绕这一命题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在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基础上逐渐形成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身份认同,^②而当代所建构的共同体还只是单面性的共同体,必须以人的终极发展为指向,走向全面性的人类共同体。^③学者们的研究对于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理解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着眼点主要是国家宏观层面,探讨地方或更低层级的主体如何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相对较少。笔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次性是非常丰富的,它由小到一户家庭、一个家族、一家企业到社区层级、乡镇层级、县域层级、地市级、省域层级,再到国家层级、洲际层级等不同层次的命运共同体相互嵌套组成,最终构建起全世界、全人类层级的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政治的结构特征相关联,全球治理也是由国家中心治理与超国家中心治理组成的一种复合结构。^④在超国家中心治理结构中,地方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也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主体之一。故对我国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机理和路径开展研究,十分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

二、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编号:18VJ024)、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中的义乌元素研究”(编号:19NDJC292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9日,第6版。

^②赵可金、赵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当代世界》2018年第6期。

^③庄友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双重价值指向》,《阅江学刊》2018年第3期。

^④星野昭吉:《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越来越成为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多方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①地方既是国家的基础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交往的重要主体,更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直接力量。事实上,改革开放使得我国地方参与国际间互动的频率日渐增多、方式日益多元、作用不断上升,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日趋重要。笔者认为,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空间交互机制

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空间交互机制的要求。每个人都生活在地方社会中,同时也生活在充满人类理想、渴望和平的更广阔的社会中。^②这种联系的客观普遍性使得不同层级的命运共同体相互嵌套、交叉和作用,存在很强的依存性、复合性、联动性。因而地方的发展尤其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人民安居乐业、保障生态环境良好等,本身就是最高层级的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组成和重要内容。国家政权作为国民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形式,在国际交互过程中往往要兼顾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以及自身内部不同区域、民族、利益群体等的诉求,因而国家间的沟通合作时常是原则性、框架性的,落地实施大都需要地方在具体项目、平台、企业、人员等方面积极参与和推动。而国家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也会体现在对地方乃至个体的影响上。在国际交往的对等原则下,由于地方的数量远远超过国家的数量,因而地方较之国家拥有更多的对等交互主体,更易找到适合互动的对象和时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放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重要内涵之一的大背景下,推进全领域、多层面、全方位开放是大势所趋,地方尤其是一些原本处于开放末端的内陆地区,借助信息化手段、现代交通网络、自贸区政策等,可能成为开放的前沿,其国际交互的广度和深度均将大幅提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显著上升。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层级网络结构中,各层级命运共同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既可以直接实现,也可以借助网络传导机制实现。一方面,从最小层级的命运共同体到最大层级的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没有严格的层级递次传导机制,即最小层级的命运共同体也会与最大层级的命运共同体直接发生交互作用。例如,一些世界知名的慈善家庭或企业通过捐款扶贫、捐资助学、免费医疗服务等方式,为其所在国或世界其他地区的贫困人口提供帮助;又如,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而淹没了一些海岛居民的家园。这是家庭或企业这一小层级命运共同体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发生直接交互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层级网络结构中任何一个节点的活动都会对其他层级命运共同体产生间接传导作用,并最终影响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反馈机制作用下,受到影响的命运共同体又会对网络结构中的其他命运共同体产生或大或小的传导作用。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③的当代,地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频繁、紧密,嵌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网络结构的程度也越来越深,上述交互反馈作用日益明显、日趋强烈。这种空间交互机制表明,地方完全拥有借助无形的网络传导机制作用于其他层级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能力,当然也受到其他层级命运共同体活动的影响,因此必须自觉地将自身活动置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格局之中,努力寻求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

(二) 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基础驱动力

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根本上是由经济基础驱动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内社会的行为体越出国境的发展所带来的,源自于国内社会自我实现的需要。^④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产能的释放,对市场范围的对外扩展产生了强烈需求;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降低了跨区域、跨境、跨国经济活动的成本,其与现代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又极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成本。这些因素驱动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步向前,促使地方经济活动出现一种“降维”的趋势,即地方原先的产业

^①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

^②Martha Nussbaum. Kant and Cosmopolitanism, in J. Bohman and M. Lutz-Bachmann (eds) Perpetual Peace, Essays on Kant's Cosmopolitan Ideal, Cambridge/London: MIT Press, 1997, p. 43.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④金应忠:《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共生性》,《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

结构较为丰富多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市场空间得到极大拓展,聚焦于某一产业的专业化效应、规模经济效益日益凸显,从而推动地方的主导产业从量大面广转向专业精干,从多个产业向专一产业、专一产品乃至产品的某一个环节转变。上述变化促使全球许多地方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进而向价值链贸易转变,深深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网络之中,形成一种休戚与共、共赢共生的关系,由此凝聚起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巨大合力。

在受到科技进步、产业变革、商业模式创新等因素作用的同时,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还日益受到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成文的并得到权力机构实施保证的正式制度安排日趋完善,有力地促进了非人格化交易范围和领域的延伸与拓展,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则相对趋弱,经济活动越来越脱离血缘、地缘、人缘、事缘等纽带,地方经济活动更为容易、深入、全面地对接世界经济体系。由此,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可达性及强度、频度均大幅提高,使原本由国家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跨境、跨国间经济互动向更为丰富多元的主体之间互动转变。例如,近年来由地方政府或非政府地方组织举办的国际性会议、城市论坛等日益增多,影响力不断扩大,已成为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和平台。它们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地对相互之间经济制度差异、贸易运行规则、传统商业习惯等的沟通、交流和理解,使经济交互关系向深度拓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三) 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等元素考量

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着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元素的内在需求。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全球化事件和争论,其根本上是快速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分享机制不合理所导致的。在快速全球化过程中,普通民众的受益相对较少,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还由于遭受全球性或区域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冲击而陷入困境。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价值导向,为破解全球化所遇到的许多难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和顶层设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力促形成更加合理的全球发展框架和利益共享机制,使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得以缓解和减弱。这就需要各个层级的命运共同体凝心聚力、通力合作,尤其是地方这一与普通民众直接联系的重要主体,必须在加快发展和力促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协调发展、共享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已写入联合国文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①这一重要论述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共生共荣指明了方向,它所代表的新世界主义与一些西方国家近年来涌现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一些西方人士的观念中,共同体是封闭的,即共同体通过向内强化对自身的认同,把共同体内部和外部截然区分开来,如基督徒彼此视为兄弟姐妹,而将非基督徒看成是异端。^②因而在推进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落地实施的过程中,如何使价值理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存在显著差别的国家和地区能够最大程度地求同存异、形成更多共识,由“握手式”互动转向“交心式”互动,既是难点,也是重点。尽管现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当今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联通非常便利、畅通,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却并未显著缩短甚至存在各种隔绝。^③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迫切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开展动情入心的交互活动,地方层面在其中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因为地方在国际交互过程中的目标追求相对简单,受价值理念、意识形态、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干扰相对较少,而以国家名义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合作交流项目则容易遭到一些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倾向的国家或地区及部分利益团体的无端猜忌、恶意抵触、污蔑诽谤。地方层面越多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体生动的交流与合作,就越能促进不同文明之间深层次的相互了解、包容互鉴、和谐共生,实现更广、更深程度的民心相通,从而为更高层面的国际交互提供坚实基础和良好条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三、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义乌样本

^①阮宗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中国战略机遇期》,《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②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

^③王新生:《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存之道的中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25日,第3版。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所在地和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浙江省义乌市给予了特别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8次在重要国际场合为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外人文交流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点赞。这表明,义乌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非常值得借鉴,尤其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已蝶变为一个全球关联区域和经济主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大市场,而新老义乌人和谐相处、文化交融、共创家业的实践突破了“文明冲突”的陷阱,这些为我国其他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义乌商圈”构建联动全球的共赢共生系统

由上文分析可知,经济全球化是地方参与和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基石、核心动力。然而,地方尤其是一些不沿海不沿边的内陆地区往往面临如何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协作的难题,义乌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些启示。自1982年义乌小商品市场诞生以来,随着其从区域性向全国性、全球性市场演变,逐渐形成了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核心、联通国内外相关区域和经济主体的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义乌商圈”。^①来自世界各地的180多万种小商品借助“义乌商圈”联通全球的商贸网络销往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一方面使原本无力自建出口渠道、参与国际分工的中小微企业只要对接义乌,就能接轨世界市场,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另一方面,促进物美价廉的各国商品实现出口,为进口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提供与其收入水平相适应的高性价比商品,提高全球整体福利水平。国内外相关区域和经济主体借力“义乌商圈”所构建的共赢共生系统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支特殊力量。

许多大型跨国公司所构建的全球性价值链分工协作体系往往具有较强的封闭性、排他性,围绕着居控制地位、中心化的跨国公司总部运作。“义乌商圈”则是一个高度开放、弱中心化的共生共享系统,它吸纳了数量庞大且具有很强的竞争性的各类市场主体。尽管义乌小商品市场居于核心地位,但交易过程是弱中心化的,如来自全球的许多客商借助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交易情景建立商务联系,其他交易环节则通过自身所在地的商贸体系完成。可见,“义乌商圈”的形成和发展归功于国内外所有参与其中的生产商、批发商、贸易商、物流商和金融、信息、中介等相关服务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市场管理者、行业协会等,其带来的诸多经济效应、产生的价值创造效应也由上述相关主体所共享。因此,“义乌商圈”的内在运行机制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共赢共生原则是完全一致、高度契合的。我国其他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应秉持这一理念和原则,在市场化机制和规则下构建开放、共赢、共享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协作体系。

(二)新老义乌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治理格局

不同信仰、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和谐相处、共生共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之一,为此提供实践案例是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任务和方式。全球性实践是由地方性实践组成的,全球性知识是由地方性知识构建的。^②唯有经过地方的充分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思想才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新老义乌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治理范例为此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义乌外来人口多,超过143万,约为户籍人口的2倍;境外人员多,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万多名常驻客商;少数民族多,是全国民族自治地区以外的县级市中少数民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城市;宗教信徒多,是全国宗教事务的重要窗口,且信教人员涉外性强、流动性大。然而,在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始终保持着新老义乌人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多年来平安建设群众满意率均超97%。这或许主要归因于义乌遵循“以人为本,服务不分国界”的理念,从政策制度、服务体系、管理举措等多方面入手,为新老义乌人创造公平良好的投资、经商、创业、生活环境,努力打造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质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理念,^③在地方层面主要体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能够和谐共处、携手创业,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义乌积极为外来建设者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建言献策等创造有利条件,如在全国首开外来建设者参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选举和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先河,开发外籍“商友卡”以实现外籍人员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日常管理等的“一卡通用”,吸纳外籍人员参与社区服务管理和志愿者活动,成立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聘请了来自12个国家的10多名外籍调解员,等等。从而力促社会群体大融合,构建起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发展新格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⑤在义乌的成功实践,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地方层面的案例。

(三) 包容并蓄的世界多元文明交融地

文化的交流、民心的交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和内驱动力。世界多样文化、多元文明实现包容互鉴的重要前提是充分的交互活动,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和路径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小商品市场网络的国际化拓展极大地促进了义乌与全球各地之间人员、商品、资金、文化等的交流,尤其是每年大量出入境和常驻义乌的外商,通过义乌认识中国、连通世界,使义乌成为了世界多元文明的交融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义乌进一步对标新加坡、迪拜、香港等国际化城市,建立完善了由市委领导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多元文化融合发展协调机构,专门制定出台相关规划和政策,搭建了以“丝路文化驿站”为代表的各类平台,大力培育万国文化,着力将整座城市打造成为国际多元文化融合高地。由此,义乌这座内陆城市的开放性、国际性甚至超过了许多海港城市,被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确定为我国首批17个国际陆港城市之一。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以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世界观与价值追求,这在义乌体现得尤为鲜明。义乌有句著名的民谚:“客人是条龙,不来就要穷”,这真实地反映了义乌人开放包容、共富共享的文化理念。在义乌,世界多种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宗教文化等和谐共存,大街小巷遍布阿拉伯、欧美、东南亚、非洲等不同地域风格的餐馆、酒店、酒吧等,许多外商将这里作为第二故乡,在此购车、买房、结婚、生子。即使来自相冲突国家的客商,也能在这里和睦相处,汇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追求之下;在宗教文化冲突成为国际冲突重要因素的当下,拥有大量来自伊斯兰教不同派别国家客商的义乌却并不存在这一问题,求同存异、包容并蓄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践行。义乌的实践充分表明,内含中国传统文化海纳百川特质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能够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共同接受,它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

四、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由上文机理分析可知,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理应成为我国地方的一种自觉行动和目标追求;同时,由义乌案例分析可知,我国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许多可选路径。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着对人类未来发展终极指向的深度关切,因而其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且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对于我国许多地方而言,既要多维度、各层次、全方位角度参与其中,又要有所侧重、发挥自身优势。尽管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各异,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方式有别,但至少以下几条路径可供绝大多数地方选择。

(一) 对接融入全球价值链贸易和产业协作网络

当今世界,随着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向价值链贸易转变,各个地方都深深地嵌入全球价值链生态系统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共同的价值创造和传递过程。对于地方政府和各类主体而言,必须充分认识并更好地适应和引领这种趋势。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努力营造开放共赢、和谐共生的价值导向。人类生存的互依性和利益相关性的不断加强,正在有力地影响着个体和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⑥必须有序引导全社会形成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尤其是经济活动和布局不仅要区域或全国角度进行考量,而且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前景进行筹划,通过与全球其他地方开展形式多样的贸易规则协商、监管平台对接、商业文明交流等活动,达成更多有利于价值链贸易和分工协作的共识。在贸易摩擦频发的当代,极有必要加强地方层面的经贸理念、规则、政策等的沟通协调,以促进不同国家之间对独特发展模式、道路的理解和包容。

^⑤①陆立军等:《义乌商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

②秦亚青:《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国际关系学:东亚合作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14日,第5版。

③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超越》,《光明日报》2017年9月23日,第7版。

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第59页。

^⑥①张曙光:《“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

另一方面,要努力推动地方主导产业的专业化、国际化,着力构建跨区域的分工协作网络。我国许多地方都形成了独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集群、块状经济,但大都属于区域性、内贸型,完全可以借助新兴科技成果、现代交通方式、数字贸易模式等,深度对接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协作网络。不求产业大而全,而是聚焦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精细产业、精粹企业、精致产品,着力培育国家级乃至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并更加注重和推动与全国、全球其他地区的上下游分工协作、产业链协同,构建联通全球的生产、贸易、服务网络,同时大力提升这一网络的开放性、共享性,将其打造成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开放共享大平台。

(二) 推动全民参与社会治理和跨区域人文交流

“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①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和目标。鉴此,地方政府必须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努力打造全体人民高度认同、开放共享的和谐美丽家园。尤其是现代社会跨地区、跨国界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规模不断扩大,社会治理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构建政府、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其中,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一些外来人口较多的沿海发达地区,更需要从理念、政策、服务等各方面入手,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外来人口柔性化服务管理模式,通过引导外来人口参与社区管理、交通文明劝导、政务建设评价等途径,增强其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并力求使外来人口在住房、医疗、社会保障、子女上学、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享有与本地人口同等的待遇,构建本地人与外来建设者共存、共享、共担、共管、共创的良好格局,打造和谐共生的地方命运共同体。

各个地方在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和推进跨区域、跨国界的人文交流与交融。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地方必须积极、深度参与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②的实践之中。应充分利用国际友好城市(友好交流城市)、国家文化周等渠道和平台,大力推进地方层面的城市论坛、文物展示、艺术交流、旅游合作等活动。充分发挥遍布全球的华人华侨熟悉住在国情况、与其政界商界精英及普通民众往来频繁深入的优势,开展丰富多样的中外文明交流、交融、互鉴活动。高度关注境外在当地以及当地在境外的留学生、教师、友好人士等,尤其是直面学生传道授业的教育工作者,通过他们向国外民众特别是代表未来的少年儿童介绍和展示真实的中国,推动求同存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三) 为国家开放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实践平台和载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大思想的实现需要地方层面积极为其提供落地实施的平台、载体和项目,这是让理论成为现实的必然要求,也是地方参与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出了一系列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部署,尤其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筹划和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等。这些既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③的关键内容,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地方政府等相关主体而言,积极主动搭建相应的实践平台和载体,为上述国家开放发展战略布局贡献力量,是其参与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最为现实有效的一条途径。

义乌尽管地处内陆,不沿边、不沿海,但积极谋划、争取国家级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大力拓展“义新欧”、“义甬舟”、“网上丝绸之路”开放大通道,尤其是“义新欧”班列被习近平总书记赞誉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早期成果”。^④对于我国许多地方而言,深度参与、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的有效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第44页。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第58页。

^③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第3版。

^④《习近平会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人民日报》2017年5月14日,第2版。

途径,而义乌的实践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地方应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推进开放的战略布局相结合,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入手,主动谋划、自觉对接、创造条件打造开放发展的平台、载体和窗口,尤其是要挖掘和发挥地方旅游资源、历史文化特色,大力引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明健康、特色鲜明、积淀深厚的文化项目,联合举办艺术周、文化节等活动,在当地有序建设一批文化交流设施。

(作者刘文革,浙江工商大学国际商务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杨志文,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研究员。杭州 310018)